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研简报

2010年第2期（总第25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0年5月25日

编者按语：科研简报从本期开始尝试进行改版，主要介绍我院教师的科研成果。本期内容是2010年一季度我院教师所发表的主要科研论文以及论著的简介，按照国际政治系、政治学系和公共行政系进行编排。

国际政治系

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

陈志敏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

在国际关系多极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美国和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三大力量中心。相应地，如何认识中、美、欧之间的三边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并加以前瞻性地应对，这不仅是中国外交战略必须思考的问题，也会牵涉未来国际体系的构造。作者对现有的三边关系理论提出了改进，试图揭示中、美、欧新三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即这种三边关系仍处于初级阶段；三方共处模式是其基本形态；美欧稳定婚姻模式是其一般特征；三边博弈具有动态变化特征，且在不同议题领域内存在差异；三边关系具有开放性。考虑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上述特点，处理这种三边关系的制度框架应该有多个路径，主要应以双边和大多边为主，并考虑发展尝试性的三边机制。

《申根协定》及欧盟共同签证政策的发展：

一体化进程中的差异化机制

陈志敏

国际观察，2010 年第 2 期

《申根协定》是 1985 年部分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欧共体框架外订立的一项国际条约，旨在取消相互之间人员流动的边境签证控制，并对外实行统一的签证制度。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申根制度实现了欧盟化，成为欧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过，在申根制度的欧盟化和扩大化进程中，欧盟形成了至少三种差异化机制，如吸纳非欧盟成员国的联系国制度、针对部分旧成员国的半成员国机制和适用新成员国的过渡成员机制。通过这些差异化机制，欧盟既发展了欧盟的共同签证政策，将申根区扩展到欧盟之外，又兼顾了成员国内部的不同利益而呈现出在差异化中推进一体化，在一体化中兼顾差异化的灵活机制。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倪世雄

吉林大学社科学报，2010 年第 1 期

世界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并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广泛的变化。如何科学准确地把握这些变化，成为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如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成为冷战后各国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改革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旧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不断地做出积极的贡献。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唐世平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1, 2010

I advance an endogenous explanation for the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offer to neatly resolve the debate between offensive realism and defensive realism through a social evolutionary approach. I contend tha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an evolutionary system and it has evolved from an offensive realism world to a defensive realism world. Consequently, offensive realism and defensive realism are appropriate gr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 two different historical epochs. Different gr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for different epoch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ifferent epoch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ctually need differe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caus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an evolutionary system, non-evolutionary approaches will be intrinsically incapable of shedding light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ust be a genuine evolutionary science and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ust 'give Darwin his due'.

唐世平教授的理论解释不仅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演变，还解决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辩论，即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他的理论解释也对国家在如今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如何寻求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唐世平教授是在这一国际政治学科中的顶级杂志发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来源：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中非关系：进展、挑战与前景

肖佳灵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2010年3月

Although being far apart geographically, China and Africa have kept friendly contact since ancient times, enjoyed an increasing friendship since 1949, and benefited more from economic ex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A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carrie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est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nations, as well as for the world, the paper, based on a brief retrospection,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recent progress and the challenges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o reach a “harmonious all-win gam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China first has to get a holistic,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picture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under a multi-dimensional spectrum, and then do lots of concrete jobs.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Changes in China's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Crises

吴澄秋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15, Number 1/2010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human rights are above sovereignty has dominated China'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Relying on a sovereignty-human rights spectrum, this article reviews China's behaviors, particularly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managing the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cris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Rwanda, Kosovo, and Darfur, and finds that there have been impressive changes i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rises. Yet, a content analysis of China's official discourse on human rights finds that China's attitudes towards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have not changed much. Drawing o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aradox.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has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norms regarding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and that, having undergone in recent years an identity change from a defensive power of bitterness and insecurity to a rising power aspiring t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China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its national image and more receptive to international norms, which has led to the changes in its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crises.

Book Review: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徐以骅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4, No. 2, April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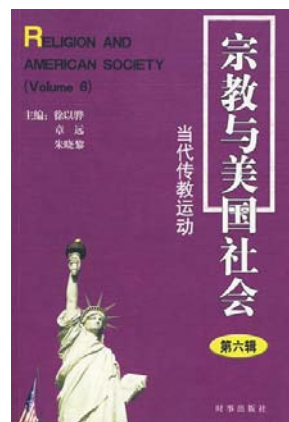
Confucius once stated that when a worker wants to produce a great work, he must first sharpen his tools. R.G. Tiedemann's recent book is one of those "sharpened tools" and researchers will find it useful in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s a prominent scholar on Christianity in China who has invested three decades of extensive research and three years of intensive preparation on the subject, Tiedemann has prepared a fine work that deserves a prominent place in all major libraries, as well as on the desks of serious researchers.

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

徐以骅

世界宗教文化，2010 年第 1 期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各种跨国宗教运动和现象风起云涌，其中国际传教运动的突飞猛进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宗教布局，而且对人们关于传教运动的传统看法和理论范式形成了具有颠覆性的挑战。该文主要针对当前国际传教运动中发展趋势和国内学界对传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国际视野、当代关怀”以及实现“四个跨越”的研究设想，以对全球宗教复兴作更为全面的学术回应。



当代传教运动的国际化、政治化、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扩大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加速了宗教的跨国流动，改变了国际宗教布局，并且增强了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序

徐以骅

(载涂怡超著《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 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当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动员资源、全球范围重大政治冲突的资源、抗衡国家的资源以及国际政治的资源），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

国际问题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 宗教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所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 然而,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 宗教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自冷战结束以来, 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 而此“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结构性权力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国际公共产品

黄河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 第 1 期

进入 20 世纪以后, 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国际活动, 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承担国际义务, 推动和加深各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存, 日益成为当代

中最为活跃一。比较有代跨国公司。从公司撕毁同购协议案可全球生产方产品结构演程度时。跨国以获得过去国家内的企的影响力。其



国际关系的因素之代表性的如最近力拓中铝的收以看出. 当式、消费与化到一定公司就可一个民族业所没有作用早已

超出传统理论中所讲的对东道国的影响。跨国公司操纵东道国的政治经济, 充当母国的外交工具, 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秩序的巨大力量。在一定情况下。跨国公司为组织跨国生产、销售而形成的全球网络和产品有可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催生者和推动者。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视野看拉丁美洲区域教育合作

黄河

复旦教育论坛，2010 年第 1 期

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正在成为研究区域教育合作的一个新视角。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优势在于，能更直接反映某区域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从而使机制和制度更切合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需要。该文研究了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一般理论，并以过去几十年来由美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或主导的区域教育项目为例，分析了区域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

区域公共产品与区域合作：解决 GMS 国家环境问题新视角

黄河

国际观察，2010 年第 2 期

近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伴随着 GMS 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GMS 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水资源匮乏和森林面积锐减等。这些环境问题日益渗透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许多 GMS 国家之间国际冲突和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文分析了 GMS 国家面临的共同环境问题，提出“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并认为 GMS 国家联合提供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将成为重要趋势。

谷歌，你想吓唬谁？

沈逸

文汇报，2010 年 1 月 14 日

2010 年 1 月 13 日，在刚刚就谷歌图书馆扫描中国作家作品一事作出道歉后不久，谷歌美国管理团队在“Google.cn 团队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发生在 2009 年的 Gmail 账户遭到袭击以及中国强化互联网管理等为理由，宣布正在考虑“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如果这是谈判的策略，那么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而失望的、没有远见的决策；如果这最终变成了一种事实，那么只能遗憾地说，再见，谷歌。



商业利益、政治作秀&灵巧权力

沈逸

文汇报，2010 年 1 月 15 日

美国多名重量级高官连续就“谷歌声明事件”强硬表态，不能不让人追问几个“为什么”：是谷歌为了掩盖自身的商业竞争不利、试图体面退场而施放烟幕弹？是部分屈服于人权游说团体压力而政治作秀？抑或是美国政府试图建立和拓展灵巧权力的新尝试？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从不缺乏借助控制、引导、塑造全球信息内容和流动方式来为自身谋取国家利益的实践。从中美关系的整体框架来看，现在因为谷歌的声明而引发的争论，仅仅是冰山上的一角，中国与奥巴马执政团队真正意义上的磨合期，恐怕才刚刚开始。

傲慢 错乱 作秀 算计

沈逸

文汇报，2010 年 1 月 23 日

1 月 21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将“连接网络的自由”上升到与美国宪法提及的四大自由相提并论的高度，让人隐约产生穿越时空的错乱之感。这篇演说充斥着美国例外主义的傲慢和用信息时代词汇重新包装过的源自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宣传口号。希拉里发表这样一个立论脆弱、形式傲慢



的演说，几乎完全背离了奥巴马政府努力维持的“倾听”与“尊重”的政府形象，部分原因是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奥巴马团队需要短期成绩来巩固选票，此外，是否也有希拉里个人政治前途的小算盘？

政治学系

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综合教学实践

邱柏生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 年第 1 期

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教学效果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些年来，人们试图通过提升教学内容的吸引力、丰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多方面的措施，来增进课程教学的有效性。该文主要关注课程的综合教学过程及其教学组织中的一些问题，主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注意诸多教学理论的综合运用，要关注理论教育与社会现实相勾连，是一种将理论魅力和教师人格魅力及课程美誉度紧密结合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学中若干理论难点探微

邱柏生

思想理论教育，2010 年第 5 期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教学中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一些有较大内涵拓展空间的内容方面。这些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与行为特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构成及规律表现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的难点主要表现在教育对象的特征一直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运用传统思路和方法已很难具有合理的解释力。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分析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其本身的属性与满足各种不同社会主体的丰富需求之间的对应程度的考察。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则表现为动态的各种教学论的复合交融的过程，这种过程的复杂性本身带来了认识的困难性。不可忽视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理论难点还在于社会现实对一定理论的挑战。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熊易寒

开放时代，2010 年第 1 期

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现实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草创政治学：从美国反思中国

陈周旺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第 29 期，2009 年 12 月

尽管美国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是它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仍然备受质疑，这说明政治学科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基础，是在美国政治学创建后近半个世纪的草创期，通过推动政治科学研究的努力而奠定的，其中，本土化、民主改革运动以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引入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相较而言，中国政治学 30 年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不足，亟待一场艰辛的草创学科的努力。中国政治学的草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美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量化的模式，而应在反思其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学本身的学科特色。

单位制下的民主：兼论企业民主制度的创新

陈周旺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在单位制研究中，企业民主制度长期被忽略，实际上，在国有企业中，企业民主制度是单位制下所形成的庇护体制的重要因素。在国有企业中，权威结构并不是纯粹的，而是与企业民主制度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权威的循环”。这种权威不仅要借助民主来强化自身的合法性，也要通过民主动员的方式进行组织激励，达到组织目的，从而在国有企业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中将发展生产和社会整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

陈周旺

开放时代，2010 年第 3 期

中共在 1946 年国共内战之前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目的就在于改变解放区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重建、巩固和强化党在乡村的组织化控制，从而为征兵、扩大军队兵源创造条件。基于这一目的，中共在土改中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性行为，包括在其控制的中心区与边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在贫雇农路线和中农路线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等等，这使整个土改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中共最终通过土改，使党组织在乡村社会扎根，进而有效地动员农民广泛参军，为中共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决定性的后勤基础。



公共行政系

加强公益服务的招标投标机制建设

敬 嘉

解放日报，2010 年 1 月 18 日

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引进竞争，通过招投标模拟市场方式来购买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公益性社区性服务的一个重要创新。但是，由于缺乏较为成熟活跃的社会组织群体，缺乏具备前瞻意识和能力的政府以及两者间缺乏信任和良性互动，公益服务招投标方式无法得到大规模应用。进一步完善招投标机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第一，要学会发现和界定服务需求。第二，要学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组织招投标过程，提高竞争性程度。第三，要善于进行合同管理。第四，要推动完善与招投标相关的其他机制。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the R&D Investment in China

苟燕楠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Volume 19, Issue 2, April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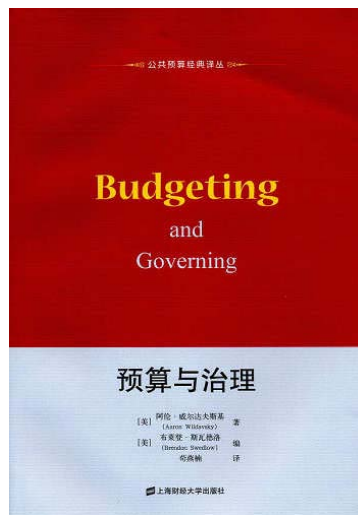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actors on firm R&D investment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like China. By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statistically tests the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R&D intensity and managerial discretion of CEOs, independent outside directors, degree of share concentration, share held by the state, and share held by a manag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managerial discretion of CEOs has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irm R&D investment. The number of the independent outside directors in the board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R&D investment. And as the shares held by a manager increase, the firm R&D intensity will decrease at first, and then increase along an inverted parabolic curve. All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ock incentive pla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ctive and long-term stock investors, may finally lead to the upgrade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预算与治理（译著）

苟燕楠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

《预算与治理》一书的框架很清晰：第一部分制定预算，第二部分预算文化，第三部分预算编制与治理。从预算实施开始，提升到文化，在返回到治理实践。凯伊将预算的基本问题定义为：将 X 元分配给活动 A 而非活动 B 的决策基础是什么？这个文艺的回答牵扯到预算的本质和目的。表面上讲，预算是个复杂微妙平衡的过程，涉及收入之间的平衡，支出之间的平衡，收支之间的平衡，但平衡既非本质，也非目的，提升治理能力的和满足公众偏好才是更为根本性的诉求，预算的目的是要建立最具生产力的政府、最透明的政府和最负责的政府。当我们对此问题有充分认识，并致力于通过预算来思考并推动各项政府工作与改革时，一个预算治理的新时代将如期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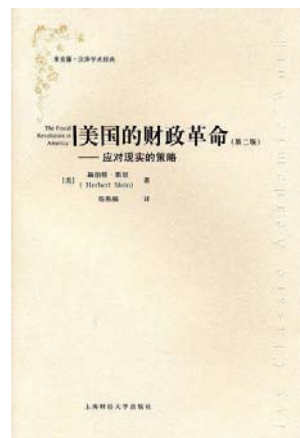


美国财政改革——应对现实的策略（译著）

苟燕楠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财政政策变迁的书，是一本关于美国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变迁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美国治国理念和思想兴衰浮沉的书。斯坦展现的是一幅错综复杂的现实画卷，财政管理和财政政策不只是某个思想家的理性建构，不只是某个政要的主观意愿，不只是某个党派的政治方略，不只是某个团体的利己行动，不只是广大公众的利益诉求，不只是对经济形势的机械反应，而是上述所有各方面的综合。书中既有对具体人物和事件细致入微的描述，也有对宏观趋势清晰明确的勾画。斯坦从美国财政管理和财政政策的变迁过程中提炼出若干基本问题和基本模式，对它们的深入分析则在最大限度上探讨了财政管理和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编辑：杜欢 何毅群

审核：陈玉刚